

卢德铭：秋收起义铸丰碑

□ 梁懿丹

1927年9月23日，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年轻的总指挥卢德铭为掩护后卫部队撤退而英勇牺牲。消息传来，毛泽东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

卢德铭，20岁上战场担任连长，21岁升任营长兼参谋长，22岁担任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总指挥。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他：“德铭同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他是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

一

四川省宜宾县双石铺狮子湾的茂林修竹中，有一处四合院式川南民居。1905年，卢德铭就出生在这里。

卢德铭6岁入私塾读书，14岁进宜宾县属白花镇高小。他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异，于1921年考入成都公学。中学期间，卢德铭不仅在学业上有较大长进，而且阅读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受到五四新思想的影响，追求光明进步的思想也逐步萌发。他曾多次对同学和长兄卢德丰表示：“要想反对列强和军阀，非用武力不可。”他暗下决心，寻机学习军事知识，有朝一日戎马疆场，铲除不平。

1924年春，卢德铭怀着满腔热血，千里迢迢奔赴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路途遥远，当他赶到广州时，黄埔军校招生考期已过。在同乡介绍下，卢德铭有幸见到了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当场面试合格后，孙中山推荐他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辎重兵队学习。卢德铭从此开始了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卢德铭如饥似渴地学习军事本领，刻苦操练。更为幸运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由此，卢德铭革命觉悟提高很快，勇敢地参加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二

1925年2月，在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战役中，卢德铭担任学生军侦察队长，带领60多名学生参战，出色完成任务。第一次参加战斗的卢德铭，就已经显示出一定的组织指挥才能。6月，卢德铭作为黄埔军校第二期学生毕业，留校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叶挺独立团在广东肇庆

成立，卢德铭调任叶挺独立团第2营第4连连长。根据党的指示，他率部在广东西江高要县一带反击地主武装，帮助地方开展农民运动。

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担任北伐军先锋，从广东肇庆、新会挺进湖南。6月初，卢德铭率部坚守安仁县城以北的渌田镇，不仅打垮了进攻之敌，还主动追歼残敌，一直追到攸县城河南岸。叶挺对此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战功是大家努力得来的，我们的每次战斗，都是得力于你们，比如攸县的占领，就是第4连连长卢德铭指挥的，他替我在指挥你们。”

在之后的战斗中，卢德铭的表现依然出众。7月19日，叶挺独立团在攻克平江城的战斗中，卢德铭率领第4连绕到敌人背后，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一举消灭了敌人。8月25日，叶挺独立团在攻占湖北中伙铺的战斗中，卢德铭率领第4连巧妙地切断了敌人的铁路运输，保证了团主力出击的胜利。在汀泗桥、贺胜桥和围攻武昌城的战斗中，卢德铭英勇顽强，指挥果断，出色完成了战斗任务，为叶挺独立团荣获“铁军”称号立下战功。

三

1927年6月底7月初，由国民革命军第4军军长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张发奎，在武昌组建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卢德铭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派担任团长。卢德铭出任团长前，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向他传达了党的指示，鼓励他为党掌握好这支武装。

此时此刻，卢德铭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肩负责任重大。他对部队的建设提出了具体又严格的要求。他常说：“我是当团长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团带好、训练好、管理好，上下团结得像一个人。”卢德铭说到做到。他没有官架子，与士兵同甘共苦，亲密无间，肝胆相照，警卫团的官兵关系因此极为融洽。同时，严酷的局势让卢德铭始终保持警惕。他加强了警卫团的军事训练，提高部队的技战术水平，并不断扩大这支队伍的力量。

当时，武汉地区的形势开始恶化，国民党反动派在湖南制造了“马日事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为避其锋芒，积蓄革命的骨干力量，一批有着丰富革命斗争经验

的共产党人先后来到了警卫团。为了保护这批党的领导骨干，卢德铭把他们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干部连，直属团部。卢德铭对这批党的领导骨干非常尊重和关心，经常同他们交谈，征求他们的意见，注意发挥他们的骨干作用。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在武汉打出反共旗号，公开叛变国民革命，大肆逮捕并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中国革命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这迫使共产党人不能不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血泊中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更振奋了卢德铭的内心。8月2日深夜，尚在武汉的卢德铭接到两份急电，一份是张发奎发来的，命令警卫团连夜于九江集结；一份是共产党人周逸群发来的，要警卫团脱离张发奎前往南昌，参加南昌起义军。卢德铭当机立断，对张发奎的电报不予理睬，积极响应南昌发来的电报，率部昼夜启程开赴江西。因敌军重重设卡，部队只得临时更改路线，在经历了几多艰难险阻后终未赶上南昌起义。随之，卢德铭带领部队来到湘鄂赣三省交界的修水、铜鼓一带活动。在修水县，卢德铭收编了一支土匪武装，安定了地方秩序、扩大了革命力量。同时，他按湖北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总指挥部，以总指挥的身份召集农民武装。

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于8月30日召开常委会，讨论湖南秋收暴动的最后计划。会议确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平江、浏阳、醴陵等县和安源发起暴动，决定成立暴动领导机关，由各军事负责人组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担任起义部队总指挥的卢德铭率警卫团参加。由于起义一开始就以攻打中心城市长沙为目标，起义军首战醴陵、浏阳县城和一些集镇，遭到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

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提出放弃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但是，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说不能为敌一时之猖獗所吓倒，留着长沙不打，却拖着部队到山里去。

当时，由于部分同志受攻打中心城市错误思想的影响，对向农村进军的策略一时接受不了，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大家把目光投向坐在毛泽东身边的卢德铭，渴望听听他的意见。这时，卢德铭站起来，客观地分析了形势，然后神情严肃地说：“现在敌人正在集中兵力攻打我们，长沙守敌也早有准备，而我军初次战斗就损失严重，这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如果我们再去攻打长沙，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反之，如果我们暂时避敌之精锐，到广大乡村去休养生息，发展力量，待我身强力壮之时，再举起有力的拳头去打击敌人，就可以东山再起，从失败中走向胜利。”卢德铭的发言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由于卢德铭是秋收起义的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威望，他的意见对统一思想起了重要作用。经过激烈争论，会议最后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决定转向敌军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这是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

四

9月23日拂晓，起义军从芦溪出发南进。因侦察不利，情况不明，当行进到山口岩时，后卫遭到敌军伏击，仓促应战。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亲自率领1个连兵力占领路旁高地，英勇阻击敌人，掩护后卫部队撤退。敌人一部占领了附近的一个山头，居高临下，子弹如雨点般不停地向卢德铭所在阵地扫射。卢德铭全然不顾，继续指挥战斗，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敌人撤退后，当地群众含着热泪将年仅22岁的卢德铭以及同时牺牲的其他40多名工农革命军指战员的尸体就地掩埋。

95载时光荏苒。9月的巴蜀大地，蝉鸣未散，荷香未枯。卢德铭纪念馆内，翠竹簌簌轻响，仿佛在向世人讲述着卢德铭那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一生。

（摘自2022年9月4日《解放军报》）



汉口大和街26号

新四军军部在这里诞生

□ 林业茂 郑大壮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并决定由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为顺利推进新四军筹建工作及军部选址问题，叶挺于10月下旬前往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新四军情况。毛泽东亲切接见叶挺，向其讲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同时对新四军的军部选址问题作出明确指示：“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延安之行结束后，叶挺于11月12日返回武汉，开始了新四军军部正式组建工作。由于经费紧张，叶挺倾向于将军部设在汉口日租界内，主要考虑抗战爆发后，日侨已悉数撤走，他们的房产已被查封。另外，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设在汉口中兴89号（今长春街57号），中共中央长江局机关就设在办事处内，新四军军部靠近这里，便于今后沟通协调工作。

选址期间，叶挺带领工作人员在汉口日租界内反复考察，一条街一条街地转，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比较。通过反复权衡，最终选定位于大和街26号（今汉口胜利街332-335号）的一幢二层住宅楼。这里距离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步行仅需几分钟。当时，这幢住宅楼处于无人居住状态，叶挺亲自带人开锁启封，随后悬挂“新四军筹备处”的牌子。

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以加强南方游击区党的工作，项英任书记。12月23日，项英、赖传珠等一批被派往新四军工作的干部抵达武汉，与叶挺、张云逸等共同商讨和部署新四军的组编工作。12月25日，叶挺、项英在大和街26号召开新四军千部大会。会上，叶挺、项英分别报告了现阶段的任务、南京和上海沦陷的经过和原因，并部署了相关工作。这次会议，标志着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大和街26号挂出的“新四军筹备处”牌子正式替换成“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牌子。

紧接着，叶挺、项英为尽快建立新四军的领导机构，接待、调配了大批从延安来的干部，配备了新四军军部各处、科干部，有效解决了新四军各支队集中整编、干部任命、隶属关系和后勤给养等问题。

1938年1月4日至6日，因战事需要，新四军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随着干部陆续到达，司令部、政治部和后勤机构逐步建立。1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新四军军部启事：“本军奉命即行整编出发，军部当即移驻南昌，前汉口大和街26号军部即行结束。以后驻汉办事处事宜，委托八路军驻汉办事处钱处长代办。所有一切公文、信电，请迳投南昌三眼井本军部为荷。”至此，汉口军部驻地作为新四军第一个军部驻地的历史使命正式完成。

（摘自2022年11月3日《中国国防报》）



我叫月海明，出生于1951年4月，今年71岁，家住江西省龙南市龙南镇红岩村月屋新村。我家里珍藏有一枚面值1分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铜币，是我母亲于2001年去世前传给我的。母亲临终前告诉我，这不是一枚普通的硬币，而是一枚有着光荣革命历史的红色文物，里面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红军战士和我们老百姓之间血肉情深的感人故事。

浴血金盆山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长征。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将留守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赣南军区第2军分区将部队编成了3个大队，其中第3大队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兼独立14团政委方志奇带领向外突围。经多次战斗后，方志奇部损失惨重，后来陆续接收了原红71团等部队失散的指战员，共计有200余人，于1935年3月中旬经龙下、东坑岭下、蛇子岬崇到达距我家5公里的金盆山南麓。部队刚一落脚，就在花瓶丘一带遭到了龙南、定南、全南、信丰2000余名国民党“铲共团”的堵截。因红军大部分都是伤员，最终因敌强我弱，弹尽粮绝，突围失败，近百名战士在战斗中血洒战场，62名红军因伤不幸被俘，只有少数红军冲出血圈上了油山。据村里当时在场的老人们说，这些被俘的红军在被国民党“铲共团”押到杨坊月屋关押时，个个蓬头垢面，衣服破烂，他们伤痕累累，骨瘦如柴，很多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国民党“铲共团”就在月屋围门口公开对红军进行拷打审讯。敌人拿着粗粗的柴木棍，将被俘的红军战士往死里打，逼问突围红军的去向，指认红军干部，很多红军当场就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但就是这样，面对敌人的淫威胁迫，红军战士自始至终威武不屈，正气凛然，没有一人泄露秘密。

险得紫铜币

我的父亲月允鹏和其他月屋围的老百姓，都目睹了红军战士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溅、惨叫连天的血腥场面。大家无不暗啻流泪，心痛不已，愤愤不平。五六个同情革命的乡亲和我父亲秘密聚集在一起，决定冒险给红军战士送食物和草药。父亲回到家里，将红军战士被迫害的情况以及商议的秘密行动，告诉了我的奶奶张海昆。奶奶虽深明大义，又担心太危险而左右为难。这时，刚嫁进门、我父亲的大嫂、我的伯母王浩昆主动请求：“我去送吧，我刚嫁过来，大家都不认识，而且妇女更不容易引起白狗子的怀疑。”父亲和奶奶也觉得由她送更安全，于是将送食物的任务交给了我伯母王浩昆。

当天夜里，我伯母围里的其他几个妇女一起从家里拿了番薯、芋头等极为简单的农家食品，藏在衣服里，一路小心翼翼来到围屋外的墙边，从墙上的小窗孔将食物迅速塞给关押在里面的红军战士充饥。正当大家准备撤离时，我伯母突然看到一只沾有血迹的稚嫩小手从小窗孔伸了出来，并向我伯母身边扔出一个东西。那个东西掉落在我伯母脚边的地上滚了几圈，发出了微弱的声响。国民党“铲共团”的看守人员这时注意到了动静，循声走了过来。我伯母连忙将东西踩在脚下，假装弯腰擦脚穿鞋。她面对看守人员的质问，镇定地说：“长官，我只是路过这里，不小心踢到了一块小石头，吵到你们了，你看我的脚也踢疼了。”看守人员在确认被关押的红军战士没有异常

一枚红色硬币的故事

□ 口述者：月海明 记录者：廖振房、月明望

后，吼叫着让她赶紧离开，并严令以后不得再靠近围墙。这时，我伯母才赶忙把东西塞进鞋里，惶惶不安地一路跑回家，并神色紧张地关上门。我父亲见状连忙问发生了什么事？伯母舒了一口气，瘫倒在地，从鞋里拿出那个小东西，声音颤抖地说道：“这是一个小红军从小窗孔里面扔给我的……”大家就着灯火，才发现是一枚沾着血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分面值硬币。我父亲看后感慨地说：“红军战士都身处绝境，但仍然纪律严明，不肯白拿老百姓一点东西，多好的部队呀！”

后来我查了龙南县志等革命史料才知道，国民党看到红军战士坚贞不屈，月屋围群众又同情革命，怕时间久了会生变化，于是过了几天就将这些红军都拉到龙南县城检尸坝枪决了，那名给我家钱的小红军也一同牺牲了。

精神代代传

这枚硬币来到我家的当晚，我奶奶就紧紧握着这枚沾着血迹的紫铜币，神色庄严地告诫全家：“今天这件事，我们家的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共产党、红军是为我们穷人打天下的，他们受的苦，流的血，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这枚硬币是无价的，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你们将来要小心保存好，一代一代往下传！”

就这样，这枚红色硬币从我奶奶手上传到了我母亲手上，2001年我母亲去世后，硬币又从我母亲手上传到了我手上。就这样，这枚硬币一直在我家被珍藏近90年。我和周围的乡亲们说，我一生都要遵照祖上所嘱，永远珍藏这枚硬币，将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下去。从那枚红色硬币来到我家的近90年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老百姓的日子一年比一年过得好。我今天把这枚红色硬币的故事讲出来，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枚硬币背后的故事，了解革命的艰辛，明白共产党、红军和老百姓之间的深厚感情，了解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更要将红色精神、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

（摘自2022年第11期《党史文苑》）



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恽代英：

□ 白光迪

始研究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受《新青年》杂志委托翻译并出版了考茨基的中期著作《阶级斗争》，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重要领导人都曾发生过深刻影响。

1921年恽代英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宣传部主任，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它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1924年，恽代英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6年5月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他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同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的行径进行坚决斗争。7月，恽代英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和发动南昌起义。12月，他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

1928年，恽代英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组织部秘书长等职，曾主编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29年6月，他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委员。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他被杀害于南京，年仅36岁。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掀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是恽代英在狱中写下的豪迈诗篇。周恩来对恽代英高度评价：“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革命青年的楷模。”

（摘自2021年5月12日《人民日报》）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武昌。1915年，进入中华大学学习。他在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春，恽代英到北京，与李达、邓中夏等建立了联系，开